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世界历史

WORLD HISTORY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第 **33** 册

十六世纪前的 中国与世界

China and the World
Before the Sixteenth Century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世界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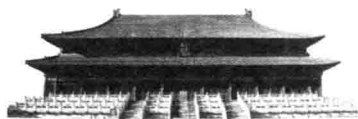
WORLD HISTORY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第 33 册

十六世纪前的中国与世界

China and the World
Before the Sixteenth Century

纪宗安 刘永连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六世纪前的中国与世界/纪宗安等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9

(世界历史)

ISBN 978-7-210-04949-4

I. ①十... II. ①纪... III. ①中外关系—文化交流
—文化史—古代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6675 号

十六世纪前的中国与世界

纪宗安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4.75

字数:380 千 印数:1-4200 册

ISBN 978-7-210-04949-4 定价:47.00 元

赣版权登字-01-2011-25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0791-86898827 电话:0791-8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世界历史》学术顾问

齐世荣 刘家和 庞卓恒 何芳川

《世界历史》总编委会

主 任 武寅

副 主 任 于沛 吴恩远 周荣耀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吴必康 汤重南 李春放 张顺洪 张晓华

易建平 赵文洪 俞金尧 徐建新 郭 方

学术秘书 张晓华 (兼)

《世界历史》各卷负责人

《理论与方法》卷 / 于 沛

《经济发展》卷 / 吴必康

《政治制度》卷 / 徐建新

《民族与宗教》卷 / 郭 方 俞金尧

《战争与和平》卷 / 汤重南 易建平

《国际关系》卷 / 李春放

《思想文化》卷 / 赵文洪

《中国与世界》卷 / 吴恩远 张顺洪

《世界历史》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钟健华

副 主 任 周 文

委 员 朱法元 邓光东 周榕芳 林学勤

徐建国 彭新元 游道勤 朱卫东

书籍设计 揭同元

总 序

多卷本《世界历史》是我国第一部专题研究与编年相结合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力求通过对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系统研究,特别是通过对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再现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科学回答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揭示人类历史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20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有多种“世界通史”问世。如英国《剑桥古代史》12 卷、《剑桥中世纪史》8 卷、《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4 卷;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10 卷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史学家 G. 巴勒克拉夫、美国史学家 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W. H. 麦克尼尔等人

对“全球史观”的探讨,促进了欧美史学中的“世界史”重构潮流的发展,近年在西方有《世界史》和《全球通史》等有一定影响的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述虽然各有特点,但任何一部世界史都是历史学家在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及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指导下,对已经逝去的“过去”进行包括价值判断在内的历史选择的结果。

在我国,周谷城先生在 1949 年曾撰有 3 卷本《世界通史》,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在 1962 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教授主编的 4 卷本《世界通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于廑、齐世荣教授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 6 卷本的《世界史》,并在 1994 年问世,以后又有齐世荣主编的 4 卷本《世界史》出版。近年来,我国在世界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全面理解、运用唯物史观,克服学术研究中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倾向、重视生产力发展历史的研究、克服“西欧中心论”的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大批外交档案及各类原始文献解密,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的体系、全球史观、总体史学、叙述史和问题史学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特别是世界通史方面的研究,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从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实际,还是从改革开放的中国迫切要求对世界历史的深入了解来看,中国学者撰写一部新的世界史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学者自己的世界通史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较大发展。整个世界史研究的进步,特别是对史

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和人类历史进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争鸣,为世界通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在理论、方法、学术思想的准备和科研队伍的培养上为撰写新的《世界通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本书是世纪相交之时,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独立理解,并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有中国特点的认识世界历史的体系。生活在当代的历史学家,如果不能把历史融化在当代之中,那他就不能理解历史,写出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结合的历史。同以往问世的《世界通史》相比,我们希望它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了解过去,清醒地认识现实,科学地展望未来。

本书采取专题与编年相结合的撰写体例,它的特点在于,强调以时间为纵线,点面结合;既有一定的时空涵盖面,又有重点专题上的学术深度,与教科书式的写法有别;与传统的世界通史性的著作相比,本课题的历史视野更加开阔,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使世界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中国史是世界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与世界,将在本书中独立成卷,重点探讨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碰撞、交融及互动。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时,我们强调新颖的研究视角、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多层面的理论描述。它是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在广泛汲取历代中外学者世界史研究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追踪当代世界史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对世界历史进行系统的、科学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从时代的角度,回答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从

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充分发挥世界史学科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

本著作是通史性的著作,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但不是编年体式的历史过程的叙述,而是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探讨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本质内容及内在联系,重视理论认识、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鉴于本课题从世界历史的广阔背景下,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时间跨度还是在空间分布上,都比以往同类著作有新的突破,所以,传统的史学方法已嫌不足。在本课题的研究中,重视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汲取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比较方法,等等。跨学科方法是对传统史学方法的补充和完善,是高质量撰写本著作的重要保证之一。

多卷本《世界历史》由理论与方法、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民族与宗教、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思想文化、中国与世界等8卷38册组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高等学校世界史学者们集体努力的成果。任何一部世界通史著作,都不可能涵盖世界历史上的一切问题、穷极历史认识的真理,并做出最后的结论。这部多卷本《世界历史》著作的完成,不是我们研究工作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本著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的最终成果,学者们在课题立项、研究和撰写过程中,一直都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本著作还得到齐世荣、刘家和、庞卓恒、何芳川等知名历史学家的学术指导。此

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江西人民出版社,也给予了许多具体的帮助,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世界历史》编委会希望,本著作的出版有助于世界历史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进一步加强中国世界史学学科的建设,加强中外世界史学者的学术交流,并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

《世界历史》总编委会
2010年5月

导 言

站在 21 世纪的门槛回望 16 世纪以前的中国与世界,犹如远眺没入云烟的蜿蜒小路,已经是渐行渐远,一片迷离。这样,想梳理出一部古代文明史,我们就必须经历(客观上也确实经历了)一个逐步纠谬和改进的过程。不但在内容上,我们要不断以审慎的考据和研究来拨开迷雾,澄清史实,而且在方法上,也要不断纠正谬论,更新理论和观点。

撰写古代文明史,通常会落入两种陈旧的窠臼。一是类似以前的世界通史写法,视野局限在欧洲或其他个别文明地区,把世界文明史写成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史或个别地区孤立发展的文明史。二是如同传统的中外关系史写法,只看到进出国门的往来人群,而忽视丝路另一端的文明碰撞。这两种做法其实都犯有机械论的错误,以孤立、片面的观点看问题,把一部鲜活的人类文明史生生割裂开来。欧洲中心论在 20 世纪以斯塔爾《世界古代史》为典型曾有淋漓尽致的发挥,他把埃及、西亚、印度和中国等重要文明区域置于一

边,而用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来叙述希腊罗马史,似乎只有希腊和罗马文明才是世界文明的核心。孤立分散的世界文明史观在西方古代史家的所谓“世界通史”作品中普遍存在。他们忽视了历史的统一性,把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看成是各个地区互不联系的孤立发展过程。而传统的中外关系史写法,则拘泥于中国狭隘的视角,无法看到西方历史活动对中国文明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正如有些学者所提到的:“对于唐代中西交流繁盛的原因,过去过多强调唐朝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国势的强盛,吸引了大批的胡人胡商入唐经商和定居”,而不能“从共时性和历史横向联系的角度,揭示大批胡人的入唐,更与伊斯兰教的兴起和阿拉伯帝国的东扩所造成的中亚政治混乱和生存压力有关”^①。

到20世纪50年代,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使人们终于认识到传统理念的偏颇,一种新的理论——全球史观开始萌生。同世纪70年代,以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为代表,这种理论在学术界造成广泛影响。“全球史”(Histoire globale)本来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术语,“它最初又称‘总体史’或‘整体历史’,是指在一个作为整体的地区中,对一定时段的历史进行地理、社会、经济、思想、政治等方面内容的综合研究,以反映这一整体的历史总貌”^②。所谓全球史观,简言之“就是用全球的眼光来考察世界历史的进程”^③。它以两种基本认识为基础:一是把世界史看成一个互相联系和作用的整体,二是各国历史文化等值论。在打破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它强调世界文明的多元性特

① 林中泽:《历史中心和历史联系——对全球史观的冷思考》,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② 张广勇:《从文明中心的到全球文明的世界史——〈全球通史〉中译本导言》, [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页。

③ 裔昭印:《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文化史编纂》,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质,并以文明为研究单位,大量运用比较历史研究方法,探讨各种文明发生发展及在人类文明统一体内相互交流碰撞、促进总体发展的历史进程。

如果做深入考察的话,全球史观并不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理论,而是继承和综合了西方已有的史学理论。古罗马最杰出的史学家波里比乌斯(Polybius,约前204—前122)在其《通史》中就明确指出:“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以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只归于一个结局……因此,要对历史的全貌有一个实际认识,不能不说个别的历史用处甚微。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①这可以说是全球史观的最早理论来源。中世纪,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基督教史学家,则把历史看成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朝着上帝规定的目标前进的过程,世界所有民族无一例外地加入了这一历史进程。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史学家鲍杜安(Baudouin, 1520—1573)进一步指出,人类历史是一个整体,不仅在时间上是世界性的,而且在空间上也应是世界性的。启蒙时代法国理性主义史派的创始人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在《风俗论》中更是以其开创性的成果从多方面为全球史观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依据:一是突破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有限视野,建立起以人类各主要文明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二是开创性地运用比较方法,从全球的宏观角度来纵横考察人类文明史;三是将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作为整体进行综合考察,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②。因此,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全球史观是一

① 引自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51页。

② 张广勇:《从文明中心的到全球文明的世界史——〈全球通史〉中译本导言》。

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世界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论体系”^①。

同时,全球史观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局限性。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在“全球一体化”社会背景下鹊噪而起的全球史观,“与其说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和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不如更为确切地说,它是为西方工业文明向全球拓展寻求理论支撑。‘全球史观’所遵奉的神圣观念仍然是所谓的‘进步’、‘科学’、‘理性’等等;‘全球史观’之所以要强调‘全球’,就是试图以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为中心,以经济为手段,通过消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来实现全球文化的一致性。而一旦当这种视角取得支配性的地位时,则意味着其他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基本上被排除在其理论的建构之外,从而产生的结果便是,作为一门学科,世界历史是用一面扭曲了的透镜来检视世界,是在为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公正、传统社会的破裂、道德标准的败落以及文化基础结构的败落寻找理论依据”^②。全球史观其实并未能完全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正像张广勇针对全球史观的代表作——《全球通史》所指出的,“其书中不可避免地遗有西欧中心论的和欧美中心论的痕迹”^③。

然而,全球史观毕竟展现了世界历史编纂的新视野,它在许多方面可以给我们启发和帮助。对待源于西方的全球史观,一方面我们不能生吞活剥和生搬硬套,而必须以批判的态度剔出其中狭隘、偏颇的因素,彻底肃清所谓民族优劣论和文明中心论的流毒;另一方面则有必要肯定其中科学的成分,学习某些可以推广的研究方法,通过改进而拥有一个真正的全球史观,为我们的史学研究

① 郭小凌:《从全球史观及其影响所想到的》,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② 吴晓群:《我们真的需要“全球史观”吗?》,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③ 张广勇:《从文明中心的到全球文明的世界史——〈全球通史〉中译本导言》。

提供发展的动力和条件。毋庸置疑,对于全球史观,从学者们在理论上的探索和研究,到史书的具体编纂和撰写,不少学术成果为我们这本书的编写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首先,以全球宏观的视角来考察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澄清过去曾经流行的种种错觉和谬论,真正理解世界古代文明史的本质特征。在“欧洲中心论”支配下,我们忽视了希腊罗马以外的其他文明,甚至对辉煌灿烂的中国、印度、埃及和两河地区四大古典文明也没有给予起码的重视,从而严重偏离了客观事实。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世界文明的多元性,但是忽视了世界文明的整体性,把各种文明看成是互不联系的事物,以条块分割的形式来编纂世界文明发展史。以1736年英国编纂出版的多卷本《世界史》为典型,在全球史观产生重大影响之前能够称得上“世界”古代文明史的著述,实际上多是条块分割的地区文明史,是各个地区文明史的简单相加。现在,通过全球史观的宏伟视角,我们便会对世界古代文明的多元性和整体性这两大特征给予充分的关注。在世界文明的统一体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各地区迥然不同的文明特色,而且可以看到各文明个体在各自发展的同时相互联系,交流碰撞,产生种种影响,并以合力的形式促进人类文明整体的发展变化。“在我们看来,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是共性与个性、统一与多样的交织,因而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不同民族地理环境的差异和各民族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文化特性使得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呈现出多元的属性和特点。”^①

其次,通过宏观考察世界古代文明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我们还能够获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作为一个不断运动的矛盾统一体,古代世界文明经历了一个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文明个体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不断扩大与邻近文明的

^① 商昭印:《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文化史编纂》。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联系。先是中国黄河流域文明与长江流域文明沟通起来,埃及文明与两河文明或爱琴文明有了联系,使人类文明在各主要地区形成发展整体;后来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发生碰撞,东西方文明也有了沟通的渠道,人类文明便在旧大陆形成一个更为丰富和可观的发展整体。正是由于各文明之间不断增强的联系和碰撞,世界文明“从远古时代各文化源点的狭小和相对封闭和分散的状态,到古代较大规模的数个文化区的形成,再到中世纪更大规模的几大文化圈的出现”^①,最后发展到全球各种文明连成一体的高水平阶段。

再次,全球史观启发我们,从中国现实的角度编纂世界文明史,必须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我国的史学研究中,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两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活动存在着严重的人为割裂的现象。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研究一开始就脱离了中国传统史学,盲目地搬用西方史学理论,削足适履地钻进西方史学的框架中来观察世界。人们片面强化了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差别,而忽视了二者客观存在的共性的一面,不能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和学术现实来研究世界历史,结果是难以构架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研究,更谈不上适应中国现实的需要。现在我们认识到,中国人的世界历史研究,理所应当包括中国在内,应给中国以足够的史学话语权和应有的历史评价;同时,我们看世界的角度应是中国的,有必要为中国现实的需要服务。“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只能是中华民族的世界历史研究,而不是食洋不化,不加选择地重复外国人的观点”^②。

具体到我们这本书的编撰——以“16 世纪以前的中国与世界”为题目来梳理古代文明史,它既不同于一般世界史的视角,也

① 裔昭印:《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文化史编纂》。载《学术研究》2005 年第 1 期。

② 于沛:《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载《学术研究》2005 年第 1 期。

有别于中外关系史的写法,而应该具有自身诸多特点。为此,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着力突出了本书的特色。

其一,以更为开阔的视野来勾画中国文明及其与外界的联系和沟通。开篇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我们不再盲从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而是在世界文明多元性这一根本特征启发下,充分利用可靠的考古资料和最新的学术成果来探索中国文明的真正来源。中国丰富的考古资料和近一个世纪的科学研究,用铁一般的史实和论据充分证明: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国本土,并且是一种多源文化,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许多地区各自发源,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形成一个复杂但又统一的体系。

在考察早期中西文明的交互动联系与影响之前,我们首先放眼于全球范围,明确远古各主要文明区域的地理位置、文明特征和交通条件,指出中国文明与其他三大古老文明在诸多方面的独特之处。相比较而言,古埃及、印度和两河流域三大文明之间地理距离较近,交通方便,因而很早就有较为密切和直接的联系。相反,远在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与其他三大文明则距离遥远,加上高山和荒漠的隔绝,相互联系和交往甚为艰难,从而在发展中形成差异明显的东西文化特征。

中国文明与外界的联系和交往具有丰富多样的方式和极为广阔的时空范围。人群的迁徙、贸易的形成、战争的发生、宗教的传播以及帝国的扩张等等,都曾是中外文化沟通的途径。其中人群种落的迁徙,应像自然物种传播那样历史久远。美洲印第安人与蒙古利亚人种的联系、大洋洲波利尼西亚人与中国东部沿海古老居民的关系已逐渐为我们所关注和印证。

在考察中西文明相互沟通的过程时,我们注意到了草原地带与农耕地带、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固有关系,并认为中西文明之间首先是通过两个地带的联结、两种文明的冲突,在东西通达的草原上辗转开辟出一条交往之路。而且在整个交往史上,游牧

民族的迁徙一直是联结中西文明的重要纽带。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西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交往要远远早于张骞对西域的所谓“凿空”;除沙漠—绿洲之路之外,连接中西文明的丝绸之路还包括草原丝路、海上丝路、西南丝路、唐蕃古道以及许许多多东西交往的孔道,而且这些孔道以稠密通达的交通网络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成为中西文明交往的庞大动脉;而在丝绸之路形成之前后,中西文明之间还曾存在彩陶之路、玉石之路、香料之路、陶瓷之路和茶叶之路……

即使针对某一时段中西文明发展作微观考察,我们也不应总把目光局限在某个狭隘的空间。能够在全球的宏观背景下来叙述中国文明的发展和东西文明的交往状况,也是本书努力达到的一项学术要求。例如,介绍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时,我们首先对上古时期世界文明发展进程加以描述,将其放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宏伟背景下展现出来。叙述东汉时期的中西文明交往时,我们放眼于整个亚欧大陆,把东汉帝国与远在丝绸之路西端的罗马帝国,以及位居交通中转和枢纽位置的贵霜帝国和波斯帝国联系起来,在对四大帝国的比较论述中描绘中西文化交流的情态。

其二,关注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重大影响和应有地位。中国文明是东方文明的典型代表,是东方文化圈的核心,从而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两大主体之一。可以说,不把中国文明包括在内的世界文明史就不是一部完整的世界文明史。早有学者曾经指出:“我们在学习世界历史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注意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第二要注意中国对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①着力描述古代中西文明发展史,我们更有必要把握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本书中,我们着意从中国的角度来叙述世界文明发展史。

① 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78页。